

理论探讨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

张清敏

[摘要] 现实主义认为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对外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认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决策者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观察到“心理环境”制定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认知方式、性格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本文介绍对外政策分析认知视角的主要理论和运用这种理论进行研究的几个基本方法。

[关键词] 外交政策分析;外交决策者;外交决策;政治心理学;认知;个性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3)01-0039-45

一、外交政策分析认知视角的出发点

冷战期间占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认为外交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过程,政府或者其主要的领导者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所有决策(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通过一个开放的过程选择能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些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制约和影响政策的选择,个人很难对外交政策的结果有任何影响,不同个性的人在同样条件下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名字和面孔可能改变,但(国家)利益和政策则不会改变。”用官僚政治模式研究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学者则认为,外交政策是在复杂的官僚机构中制定的,政策制定过程对效率的追求要求彻底摆脱个人的私心杂念,感情好恶,因此决策机制和过程限制和制约了个性发挥作用,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

那样。人对现实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如信仰、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的方式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的关系。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信仰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认识过程的研究,有的则侧重于对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则将精力放在对外交决策者个性的研究上。概括起来,这些学者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close-minded),对外界的变化适应是缓慢的,或者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拒绝接受这

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策。这种方法强调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可能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1]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2]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3]博丁也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4]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5]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罗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斯布罗特夫妇在1956年发表的“国际政治背景下

人——环境关系的假设”一文引起很大的反响,九年后又被扩充成一本书。他们指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决策者一般都有一种“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经过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构成的“透镜(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的。“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6]这种被观察到的环境被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 milieu)”,它和“操作环境(operational milieu)”,或者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或地理环境是有区别的。“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7]但是决策者制定了外交政策以后,就必须在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中执行。他们指出,对于研究决策过程来说,掌握研究决策者对“操作环境”的认知,也就是“心理环境”,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确定的目标,则取决于政策是否符合实际环境。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外交政策结果。这一时期从认知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受心理学中态度(attitude)或态度变化(attitudinal change)的影响,根据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的观点,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依赖于主要的信仰,而且尽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会回避、抵制与自己的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的信仰的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信仰和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

运用这种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突出代表是霍尔蒂蒂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霍尔蒂蒂根据有关认知的理论将信仰系统分为两部分:对现实的影像(image of the fact)和对前景的影像(image of what ought to be)。前者影响对现实的认识,后者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直接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信仰系统是包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系列的“印象”构成的,是一套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进入人脑所必经的过滤器。决策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政策。在决策过程中每一个

决策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现实环境(外部)经过由基本信仰构成的镜片的过滤,形成对现实的反映,然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信仰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人们对现实看法的不同,最终解释了国家间外交政策的不同。霍尔斯蒂搜集了434份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资料,包括他在国会的证词,答记者问,演讲等,然后利用“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方法对杜勒斯的所有讲话进行分析,特别是他3584次提到苏联时的用词。他发现杜勒斯对苏联怀有非常难以改变的“敌人的印象(image of enemy)”,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这一结果和心理学中的“认知的一致性”理论是完全吻合的。如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不信任来自苏联的与他对苏联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一旦遇到这样的信息,他或者去寻求与他的印象一致的信息来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对外界变化的生硬态度源于一种他认为苏联“天生是不可信任”的固有认识。他认为,“只要苏联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它就代表杜勒斯价值观念核心的对立面。此外,可能挑战这种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不可信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因此很不可信,而且通常是含糊不清的,足以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解释。”对苏联所采取的缓和政策,杜勒斯则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外交政策失败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因为苏联爱好和平。比如1955年苏联与西方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允许奥地利在西方阵营内保持中立,导致了东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对此杜勒斯认为这决非因为苏联有善意,而是因为苏联农业政策失败而导致的国家虚弱和苏联整个对西方政策失败的结果。此后对于苏联为缓和国际形势裁减军队120万,杜勒斯也认为,苏联的出发点是恶意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经过记者一轮轮问对之后,一个记者说,“从您今天早上所说是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您更喜欢让这些人当兵?”杜勒斯回答说,“当然,我宁愿让他们站在那里站岗,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核武器。”^[8]霍尔斯蒂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案例研究从决策者认知的角度揭示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矛盾的升级。

另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关系的学者是乔治。他在“行为准则(operational code):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方法”一文中对列特斯(Nathan Leites)1953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行为准则”进行了提炼,提出“行为准

则”指“政治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信仰,历史发展可以决定程度的看法,以及其正确战略和策略的观念等。”他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分为哲学信仰(philosophical belief)和策略信仰(instrumental belief)两个方面来研究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信仰对苏联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9]这些准则可以通过对10个问题的回答来得出。反映哲学信仰的5个问题是:(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政治从本质上是普遍和谐的呢?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2)最终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个人能乐观吗?还是必须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乐观的?(3)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这样的?(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反映策略信仰的5个问题是:(1)选择政治行动的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2)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3)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4)什么是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政治目标的“最好时机”? (5)实现目标时采取的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行为准则”和另外一些学者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思维步骤进行研究所提出的“认知过程图(cognitive map)”是一致的。“认知过程图”是指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特定环境下理解环境的一套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决策者在观察形势并根据需要做出一定决策的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信仰的扩充(initial amplification of relevant beliefs),寻找先例(解释事件),评估后果,寻求可供选择的政策,做出外交政策的决定。他们为领导人的行为及其过程确定了界限。^[10]乔治在他文章中指出“行为准则”又可以称作“认知过程图”,但是“行为准则”因为乔治的提炼和推广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影响了很多运用“行为准则”的方法来研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不仅被用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不少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11]而且也被用来研究其他国家或人的外交政策。^[12]

从19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认知的革命,认知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又开始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或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研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个人的作用

和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是认识上的吝啬鬼(cognitive miser),他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依赖于现存的信仰和图式(思维结构)去解释客观世界。他们在发展认知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态度或信仰是相当复杂的,内部是由多种不同的内容组成的,因此认知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处于核心部分的信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误认识》。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13]

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如拉尔森对遏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程。^[14]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政府外交决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出在上台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员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基本一致的,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认为那些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势,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升级,从第一次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开始,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认识,而万斯基本上保持了对苏联原来的认识。卡特先是摇摆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彻底倒向布热津斯基。罗赛蒂指出,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越一致,那

么这个国家外交政策越可能与这个统一的信仰一致;相反,如果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不一致,外交政策就有可能与这个国家决策层的信仰不一致。^[15]这两个研究都反映出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是可以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因决策者的教育程度(是否专家)、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以及决策时的形势特点而异。

三、主要方法:内容分析、案例分析与过程追踪

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参与了这个决策过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决策者。但是相对于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它处于其它一切影响外交政策结果的因素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中间。人们常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变化,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国际的或者是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它们才会有意义,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正如罗赛蒂所说,“把信仰作为因果关系的核心,其主要优势是在理解外交政策时把环境和心理的因素结合到一起。同时,因为认知的方法是研究决策者的‘心理环境’的,因此学者在研究时还应该对‘操作环境’的直接影响保持敏感以使对外交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16]

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时,常常会发现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心理学概念,如认识、认知、信仰、动机、印象、信息处理过程等等。这种不一致说明不同的学者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将这些因素作为变量研究其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时往往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自己的界定,进而展开研究。罗赛蒂1999年在外交学院进行讲学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些不同的内容(概念)相互关系如何,在头脑

中是如何组织起来,并构成人的信仰系统并发挥作用的,至今还没有理顺,这应该是这一领域将来的一项任务。在多元主义的美国,这可以说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界定,这些概念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运用到对实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研究时难以操作。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一般借助两种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法”,也就是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可能的话对研究对象本人或对其一同工作者的采访,报纸对研究对象的报道,以及传记等二手材料等,对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如数某一个词用法的次数,对研究对象在谈到某一个国家或事物时常常使用的词进行分类归纳等手段,得出研究对象对一个国家或者事物的认识(或者是错误认识)、态度、乃至信仰,以及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动机。进而找出研究对象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的认知过程,找出认知、信仰等其它心理因素对外交政策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本文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借助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霍尔斯特关于杜勒斯的研究作为“内容分析”的一个典范被多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论文集收入。

另一个手段是案例分析。信仰或认知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对外政策制定者发挥作用的,因此在从认知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采取案例的方法,这些案例有对重要决策者一个人的研究,如研究较多的有对杜勒斯、基辛格、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毛泽东等对其国家外交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外交决策者的研究;有对一个重要的决策群体进行的研究,如对前苏联共产党核心信仰的研究(如行为准则),以及利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信仰系统的研究,对美国做出入侵古巴猪湾的决定和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的决策过程的研究,以及对杜鲁门和卡特政府决策小组的研究等;也有对精英群体,或知识分子的研究,如沈大伟在《美丽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观的研究等。^[17]

在探索信仰、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有两种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是“过程跟踪程序(process tracing procedure)”,这种方法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详细过程,比如说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等。这种

对决策过程的详细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但是这种方法比研究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更难,因为它需要更多更详细,而且又都是更难以获得的材料,需要完全借助心理学的手段。因为信仰无形,认识过程又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更难把握。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时采取的方法之一,是运用跨领域的比喻和同一领域的类比,把看不见的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事物与一种一般人都比较熟悉的东西或事物相比,从而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决策者的观点和看法。^[18]这种方法在国际关系中常常被使用,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原意则是用容器(container)把苏联“装(contain)”起来,翻译为“遏制”。这里共产主义的苏联被看作是一种哪儿低就往那里流的一种“祸水”,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识经过这样一个比喻就非常清楚可见。人们比较熟悉的类似比喻还很多,如国际关系史中的“冷战”、“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毛泽东的“纸老虎”的观点等。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美国政府则把伊拉克的入侵说成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强奸”,这里显然是将之比做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一种暴行,说明美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称一些他认为不负责任的国家为“流氓国家”,则是把国家行为比作是一个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流氓”。这些比喻都使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具体,使研究者能够把握研究对象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发展。

与比喻稍有不同但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是利用同一领域的类比。也就是把一些不清楚的决策环境与历史上人们熟悉的事件或情节进行类比,从而使人们对新的模糊不清的形势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杰维斯在研究错误认识产生时说:“国际上以前发生的事为政治家提供了广泛的可以想象的环境,使他能探测到(事物间的)基本模式和因果关系,帮助他理解他的世界。”^[19]如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形势与历史上希特勒占领捷克斯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从而看到美国决策者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看法。^[20]如布什政府最近用“邪恶轴心”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比作二战期间的德、意、日等,这样就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这三个国家的认识。借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理解一些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过程。如美国决策者在做出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

的认知过程通过几个比喻和类比则非常清楚了。首先,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是“祸水”,必须“装(contain)”起来(比喻);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莫斯科指导下的共产主义在全球进攻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misperception);第三,在产生了这样的错误之后,美国决策群体运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类比,也就是把朝战的爆发以及北朝鲜在战场上的优势比作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大利占领索马里等,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那就是绥靖。^[21]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战争。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 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决策过程,更不研究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不需要有关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的详细材料,只需一方面找出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决策者国家的具体外交行为,如果它们一致了,就说明决策者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沃克利用“行为准则”模式对基辛格的研究。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correlation),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M. 赫尔曼提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决策者是否对外交感兴趣,对周围环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外交的经历,或者是否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等三个变量可以解释领导者的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她通过对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决策者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信仰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则不发挥作用。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拟展开。^[22]

认知的视角只是外交政策分析(从广义上说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要求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次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但是由于认知的视角处于影响外交政策的所有变量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各个层次,特别是随着对外政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外交的研

究。^[23]

[注释]

- [1]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39.
- [2] Ibid., p. 28.
- [3] Quincy Wright,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ppleton, 1955), p. 433.
- [4] Quoted in Jerel Rasati, “The Power of Human Cognition and Policymaker Beliefs in Foreign Policy and World Politics,” manuscript.
- [5] James Rosenau, “Pre-Theory and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in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 Barry Farrell e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97-100.
- [6]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18.
- [7] Ibid., p. 224.
- [8] Ole R. Holsti,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ed. James Rosenau,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 548.
- [9] Alexander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 and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3, 2, (1969).
- [10] Jerel Rosati, “A Cognitive Approach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eds.*, Laura Neack et. al., (NJ: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5), p. 57.
- [11] Davis B. Bobr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Conflict System,” *Orbis*, 9 (Winter 1966); H. Boorman and S. Boorman, “Strategy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in China,” *The Annals*, 370 (March 1967); Tang Tsou and Morton H. Halperin, “Mao Tse-tung’s Revolutionary Strategy and Peking’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9, (March 1965).
- [12] Stephen G. Walker, “The Interface between Beliefs

- and Behavior: Henry Kissinger's Operational Code and the Vietnam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no. 21, 1977.
- [13]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8.
- [14] Deborah W. Larson, *Origin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5] Jerel A. Rosati,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Quest for Global Community: Beliefs and Their Impact on Behavior* (Columbia S. 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7).
- [16] Jerel Rosati,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 67.
- [17] David Shambough, *Beautiful Imperialism: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8] Keith L. Shimko, "Foreign Policy Metaphor: Falling 'Dominoes' and Drug 'Wars',"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p. 71-84.
- [19]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17.
- [20]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n,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1]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就是根据这样类比起来看待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的。见 Harry Truman, *Memoirs*, vol. 2,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56), pp. 332-333.
- [22] Margaret G. Hermann, "Effects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on Foreign Policy," in *Why Nations Act*, p. 57; Margaret G. Herman, Charles F. Hermann and Joe D. Hagan, "How Decision Units Shape Foreign Policy: Development of a Model," Paper prepared for the 1991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Helsinki, Finland, pp. 4-5.
- [23] 研究中国外交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Allen S. Whiting 早期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国跨过鸭绿》(*China Acros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1960)和《中国深思熟虑的威慑》(*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1975)都是采用传统的理性行为的方法,但在1989年出版的另一本关于中国外交的书则是从认知这个角度来研究的。见 *China Eyes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类似的专著还有 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978-198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Shambough, *Beautiful Imperialist*.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 China Views the Worl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Gerald Chan, *Chinese percep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作者简介: 张清敏,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 博士。(北京, 100037)

收稿日期: 2002-09-02